

福建文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

· 建国后史料专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建国后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地址：福州五四路 21 号省政协大楼

邮政编码：350001

福建省、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94 印张 195.22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SN1005-7447

CN35-1053K

定价：4.50 元

主 编：吴修秉
副 主 编：黄小宁
责 任 编 辑：林 桦
打 印、校 对：郑广红

目 录

岞坊山上截敌记

——回忆解放福州的一次战斗 …………… 卢福祥(1)

飞向光明的瞬间

——驾机起义的经历 …………… 郝隆年(5)

歼灭郭万年武装匪特追忆 …………… 郑炳山 蒋国华(13)

陈令德及“泉州纵队”覆灭记 …………… 郑万水(18)

回忆围歼“永安纵队”的战斗 …………… 郑炳山(28)

万湖山围捕空特 …………… 涂庆南(34)

剿匪征战记

——人民解放军 87 师暨 253 团闽中、~~闽西~~剿匪忆略
…………… ~~梁凤鸣~~(37)

解放初期建瓯的匪患与剿匪斗争 / …………… 施大炳(41)

战斗在红土地的深山密林中

——闽西剿匪斗争综述 …………… 郭元坤(68)

奋战杭川平匪患

——解放初的上杭剿匪斗争 …………… 钟巨蕃(84)

岚岛风云

——平潭剿灭海匪记略 …… 李 林 李鹏云(90)

接管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始末	洪升文(98)
接管与兴建	
——参加建国初期福建水利建设的片断回忆	
.....	殷孝友(102)
忆铁道兵抢建鹰厦铁路	王沛浩(113)
陈嘉庚先生支持将集美划入厦门市	
——记一次征求意见的访问	李 原(119)
情注鹭岛	
——记建国初期陈嘉庚先生的两次倡议	
.....	张维兹(122)
中新社福建分社的成立和发展	常家祐(127)
一份办给农民看的报纸	
——忆《福建农民报》	李 彬(134)
福建人民广播事业的部分历史回顾(二) ...	吴 徕(139)
福建省血吸虫病之消灭	
——血防工作的简略回顾	董永年(189)
我所了解的福建丝虫病防治研究工作	刘心机(200)
国宝神药 享誉天下	
——记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	林俊文(213)
文房第五宝	
——记漳州八宝印泥厂	肖 林(221)
福州回春中药店	杨 英(232)

岫坊山上截敌记

——回忆解放福州的一次战斗

卢 福 祥

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当时，福州守敌有国民党军第六兵团、第八兵团、第二十二兵团所属5个军、14个师，实际兵力约6万余人。我军兵分三路，左翼31军由罗源、连江向福州发起攻击，占领闽江口沿岸要塞，断敌人海逃路；右翼29军攻永泰、夺福清，以断敌由陆上向平潭、厦门的逃路；中路28军则沿闽江两侧发起攻击，力求把敌人聚歼在福州地区。

当时，我在29军254团7连担任连长。我团在8月16日攻克福清县城，肃清龙田、海口残敌之后，突然接到军部转来兵团电报，说福州之敌已有部分过了乌龙江，向南突围，命令我部迅速赶至宏路以北地区，拦击逃敌。

连续几昼夜的行军打仗，同志们都极度疲乏。当我在海口镇一座教堂内，把刚躺下就已沉睡的战士一个个叫起，向他们传达了这一情况时，战士们都睁大充满血丝的眼睛，围着我异口同声地说：“连长，行动吧，一定不能让这股敌人逃掉！”

“对。”我望着战士们激奋异常的神情，说：“但这要靠我们的飞毛腿，在天亮前赶到宏路以北地区。”

“连长，你放心，你能赶到，我们绝不会掉队。”战士们带着一种向我挑战的口吻，保证说。

“好，比试比试吧。现在就出发。”我听到战士们铿锵有力的回答，心里感到无比舒畅。

我团连夜出发，急行军 100 华里，于次日上午赶到宏路北的山凹口，迅速摆好阵势，抢筑工事。

中午时分，天空乌云翻滚，下起哗哗大雨，忽见一位老乡戴着斗笠，披着雨衣，从岞坊山脚下的一个村庄急急走来，向我报告说，家里来了好几个国民党兵，正在抢粮、捉鸡、做饭吃。

“呃，这是一个新情况。”我对副连长王洪芳说。

当即，我带领一个班，跟随这位老乡到他那个村庄，把正在吃饭的 7 个敌人俘虏了。

据俘虏供称，福州突围敌人怕我们在福厦公路上设伏，改变了行军计划，不走公路走山路。现岞坊山上有第六兵团司令部和独立 50 师约 5000 余人。

我当机立断，一方面派人把情况向营部报告，一方面和王洪芳率领全连向岞坊山主峰进发。这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乌云翻滚，山洪暴发，山野间一片茫茫。全连冒着大暴雨，穿过蒿草丛林，淌过湍急的溪流，迅速攀登上岞坊山主峰附近的一个山头。隔山望去，只见岞坊山主峰曲折的小径上，蠕动着一支队伍，队伍中隐约可见妇女和儿童。显然，这就是敌第六兵团司令部机关，并有家眷同行。俗话说“打蛇打头，擒贼擒王”，对面山头上不就是“头”、“王”吗？但是这一支灰溜溜的队伍，没头没尾，不知从哪里下手吞掉它。当时我想，应该立即把敌人抓住、拖住，等待后续大部队到达后将其围歼。

这是歼敌立功的大好时机，但需要胆识和勇气。

战士们的手已被蒿草划破，脸被荆棘划出道道血痕，然而，眼前的情景又使他们激奋不已。我和王洪芳当即把全连分成几路。大

家朝长满杂草灌木的山坡上一坐，顺着向下泻去的雨水，象坐滑梯一样直冲山脚，站起来后又立即艰难地向岫坊山主峰冲去。

“蒋军弟兄们，你们已被包围了！”

“缴枪不杀！”

“解放军优待俘虏！”

一刹间，战士们高亢的呼喊声，震荡山谷。

敌人一发现我们，官兵乱窜，女人号叫，孩子啼哭，乱哄哄向草丛、山洞、泥坑里钻去。胆大一点的，把枪朝地上一放，坐在山路一旁，惶恐地瞧着我们在他眼前匆匆跑过。

不一会儿，我在一座草寮里俘虏到一名戴着近视眼镜的敌军军官。他带领我来到一棵大榕树下，向树旁的一个土洞喊道：“参谋长出来吧，解放军优待俘虏！”这时，洞里传出几声狼犬吠声，接着一名佩少将肩章的敌军军官，披着雨衣从洞里弓着身走了出来。不知是冷还是怕，一出洞来就抖抖索索地咽了咽口涎，向我自作介绍：“我是……国军……第六兵团参谋长……何同堂。”接着他把一支白朗宁手枪和一把“军人魂”（一种佩在腰间准备自杀用的短剑）交给我。当时，我心里非常高兴，虽然浑身湿漉漉的，却感到十分舒服。我严厉警告他说：“你们前路被阻，后路已绝，处于我军包围之中，你快下令所属部队交枪投降吧！”

“是，是，是。”何同堂把头点得象敲木鱼。

“还有，”我补充说，“武器装备不得损坏！”

“是！是！是！武器装备不得损坏。……啊……这里有一点点小意思……你收下吧！”边说边朝我手中塞来两块沉甸甸的金块。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是我军的政策，俘虏的私人东西，我们不搜不要，请你放心。”为了使何同堂免除恐惧，我把话说得尽量和缓，并推开他塞来的那两块金子。

“少有，少有，真是纪律严明之师。”何同堂又不停地点着头。

过一会儿，从山上各个角落走出许多敌兵。战士们喝令：“就地

坐下，把枪放在地上！”俘虏们应声顺从地，在山径一侧潮湿的地上——坐下。

忽然，我见到王洪芳押着一名佩带少将肩章的俘虏从右边的山坡上走了过来。俘虏中等身材，左腿残疾，走路一颠一跛的。由于路很滑，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我面前，站定后行了个军礼，自我介绍道：“我是国军独立 50 师少将师长萧地庚。早想投诚，一直没有机会，今天遇到你们真是如愿以偿了。……周恩来先生是我们黄埔军校的老师，我还懂得些俄文，我要发电报给他，请求他送我到苏俄去学习……”他一见到我就像见到故友似的滔滔不绝的说着，毫不在意我身边站着他的顶头上司——兵团少将参谋长何同堂。

“噢……是吗？……”我一边掏出挂表看着，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天色渐暗，雨渐渐停了，夕阳把西天的云彩染成五彩缤纷的颜色。营长、团长率领部队早已赶到。干部、战士眉笑眼开，他们押送俘虏，处理战利品。我看时间已 6 点多了，转身向何同堂、萧地庚诙谐地说道：“天要黑了，乘亮下山，可免摔跤！”

就这样，由福州南逃之敌，全部被截歼俘虏。我连未费一枪一弹，俘敌两名少将军官及校官以下数千人。福州战役也告胜利结束。

（写于 1989 年）

飞向光明的瞬间

——驾机起义的经历

郝 隆 年

1955年，我在台湾任国民党空军作战司令部少校作战官。1月12日上午，按计划进行飞机训练，我驾驶112号美制C—46大型运输机随带机组成员2人，由台中机场起飞，毅然驾机起义，冲破重重险阻，飞回祖国大陆，降落在福州机场。从此我结束了困居孤岛并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监视的苦闷生活。我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此情此景，终身难忘。

—

“七·七”事变后，我的家乡山东便遭到日寇的进攻，成为抗日前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怀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信念，为抗日救国，毅然投笔从戎。

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无数同胞被炸死炸伤，目睹这种情景，我的内心十分激愤，因而我立志要当一名飞行员，驾机凌空，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1942年我考取了国民党空军航校，在四川铜梁空军入伍生总队入伍，尔后到成都空军航校，学习航空理论和初级飞行技术。后因器材来源断绝，飞行训练停止，航校便聘请了几位金陵大学的教授来校讲课，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学员均达到了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不久,我转到昆明空军航校学习外语与国际礼节,准备出国深造。

1944年我从昆明出境,经印度到达巴基斯坦拉合尔机场的空军训练基地,接受初级飞行训练,后经美国考试官鉴定合格。同年12月我从孟买乘船去美国,在洛杉矶上岸后,就进入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亚训练中心,接受入伍训练。3个月之后,转到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初、中级飞行训练基地,学习PTA—17和AT—6型飞机驾驶技术,以后又到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得高级航空学校,学习B—25轻型轰炸机飞行作战技术。为了学好杀敌本领,我自始至终勤学苦练,希望早日回国参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回国杀敌的愿望未能成为现实。因当时国民党手里有大批的C—46型飞机但缺乏飞行员,所以我们后来转到得克萨斯州奥斯丁美国第13航空队训练基地,接受C—46大型运输机驾驶技术的训练。1946年底训练结业,我从旧金山乘船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20大队,驻上海江湾机场。

二

回国途中我曾有过美好的梦想,以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将要走上和乎建设的道路。但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撑腰,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美军也在中国横行霸道,我感到莫大耻辱,心中无比愤慨。

回国以后,同队的许多同事,都请假回乡探亲,我也很想回到山东家乡看看离别多年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但国民党空军当局规定,凡是飞行员一律不准去解放区探亲,因而我请假回乡探亲的要求遭到拒绝。当年我投考国民党空军,初衷是抗日救国,为了不当亡国奴,但到第20大队后不久,便被迫驾驶飞机替国民党军队运兵、运送武器弹药去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内心感到无限痛苦。就在这时,一次例行的体检中发现我患了肺病,被停止飞行住院治

疗。出院后，我继续休养，但心里时刻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担忧，十分苦闷和烦恼。

当时南京、上海的官僚和投机商人翻云覆雨，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这个时期，我看了一些进步书刊，和一批倾向进步的同学和亲友时有接触，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同学张何周，他和我1942年一同在铜梁入伍生总队入伍，分配在同一中队，朝夕相处，感情很好。入伍不久，中队发生了一起学生暴动事件，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策划者，是共产党，因而被开除。张何周离开的那天早晨，我悄悄地把他送出营房，后来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他去苏北解放区时路过上海，我们两人在一起谈了很久，他的进步思想给了我很大启发和鼓舞（没想到，我起义归来后第一个采访我的解放军新闻记者正巧是他，见面之后我们都很高兴）。从此以后，我每到深夜便悄悄地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期间收听到我同期的同学刘焕统、邹跃坤，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驾机起义飞到解放区的消息。这鼓舞人心的壮举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因身患肺病，虽然有弃暗投明的愿望，却还无法实现。

三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因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面临全面瓦解的形势，于是命令所有在沪空军人员，紧急撤往台湾。1949年，我被迫带病随队去了台湾，最初在新竹，后又迁到台中。

国民党溃败到台湾后，进一步投靠美国，更加法西斯化，疯狂镇压台湾同胞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军事当局对飞行员更是严密控制，除用提升、奖赏等进行拉拢外，还派遣特务监视，实行“5人联保制”，如有一人“投共”，其余4人要连坐判刑。但这些反动措施动摇不了爱国志士向往光明的决心和斗志。在我之前从台湾驾机

起义的黄铁骏，是我留美时的同学，我们关系极好，到台湾后住在一块，朝夕相处。出于热爱祖国、反对黑暗统治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俩在暗地里常常商量弃暗投明、驾机起义的事。他驾机起义成功的消息，更增强了我起义的决心。

在黄铁骏驾机起义之后，国民党当局对飞行员进行严密的防范，采取了种种措施：机场上每架飞机都派两名士兵看守，任何人不能在无证明时接近飞机，机场两旁还架设了高炮和高射机枪，如未经塔台允许，起飞后就要被击落；另外还规定 C-46 在台湾上空飞行时，每一机组至少 3 人，并严禁携带武器。

我秘密地将航行资料、地图和手枪等准备妥当，积极创造条件和耐心等待时机。事情也很凑巧，经过一个朋友的推荐，我由上尉飞行员调为大队作战科的作战官，参与制定飞行计划、派遣飞行人员和出动飞机的军事指挥作业。1954 年底，我被晋升为空军作战司令部少校作战官，去金马前线任陆军联络少校作战指挥官，并发给我一份任职书（人事命令），要我在近期去报到。在行将赴任之际，我利用例行的本场飞行训练机会，将自己的名字填入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内。得到批准后，决心在第二天驾机起义。在起义归来的前一天晚上，即 1955 年 1 月 11 日夜，我辗转反侧，思潮起伏，一方面因有可能顺利返回大陆，而抑止不住狂喜；另一方面也担心一棋不当要输全局，一言不慎要送性命。我告诫自己千万要提高警惕，沉着应付。

1 月 12 日清晨，起床之后我即刻去食堂吃饭，而后穿好飞行服，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藏有机密航行资料、地图和手枪等物的航行包，开车疾驶机场。车很快抵达飞机旁停了下来，我看到少校作战官王钟达和机工长唐镜已先到，和他们礼貌地寒暄了一番之后，便进行飞行前的地面检查。当时我心里有些紧张，一会儿机工长用肯定的口气说：“OK！”，才感到轻松了一些。我们相继登上飞机进入驾驶舱，开车、试车，而后将飞机滑行到起飞位置，随即向塔台请

求起飞，经塔台指挥官允许，我加大油门，飞机迅速离开地面。好像久困牢笼的飞鸟展翅蓝天，我内心充满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激情。

我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当飞行高度上升到 2000 米时，改为平飞，然后我叫王钟达驾驶飞机，我自己向后舱走去。一到后舱我就大声喊叫，要机工长到下舱去（他正坐在椅子上打盹）。他被我的喊叫声惊醒了，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要他到下面检修。他一下舱我就随手把舱门关好，急忙返回驾驶舱。王钟达见到我的这种举动，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顺从了我。此时，我急忙将飞机转向福州的航向，迅速向下俯冲。当飞机高度下降到 20 米时，就在海面上作超低空飞行。为防遭追击，我用无线电迷惑塔台指挥官，我说：“飞机在台中东南方向发生故障，紧急呼救。”然后我就把耳机挂在驾驶盘上，对方哇哇乱叫，我置之不理，只顾加大油门朝前飞。台湾雷达站很多，我一离开台湾向大陆方向飞，就会被他们发现派飞机追击，所以我告诉他们，我在台中东南方向。当时我想，如果他们派飞机去那里找不到我，再回头来追击我时，我已经快飞到大陆了。不过，据后来由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何伟钦讲，台湾空军当局曾同时派飞机分两路追击，一路飞往东南方向寻找我那架飞机，他本人也参加了；另一路朝大陆方向追击，但因我的飞机有保护色，而且是在海面上作超低空飞行，他们是喷气式飞机，在高空飞行，所以没有发现我的飞机。

当飞机飞临海峡上空时，低空有雾，能见度差。突然发现有一艘台湾军舰在正前方相距很近，躲已来不及，我猛加油门，以最大速度一掠而过。军舰发现飞机，急起攻击，但并未击中要害部位。我一往直前，朝大陆方向继续飞行，接近大陆时，开始爬高，不久便看到福州机场。准备着陆时，飞机襟翼放不下来。原来是那个被关在下舱的机工长把高压油管搞断，油都漏光了。飞机速度太大，着陆十分危险，而且加力系统失效，我一个人操纵飞机力量不够。在这

紧急时刻，王钟达协助我一同操作，将飞机勉强地降落下来。飞机落地滑跑时速度很大，幸好飞机顶上的天线杆撞到架设在跑道上空的一捆电话线，虽然把电话线都撞断了，但速度减了下来，飞机保住了。

四

1955年1月12日上午9时左右，我走下了舷梯，久久盼望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在场的军民热烈欢呼。当解放军同志和我亲切握手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飞机着陆不久，解放军同志对我讲：“你这架飞机落地之前，已经有3批喷气式战斗机飞到机场上空，一定是冲着你这架飞机来的，要赶快把飞机遮盖起来！”他即令战士用树枝、稻草把飞机遮盖起来。刚把飞机盖好，机场就响起了警报。当敌机飞临机场上空时，我高射炮部队以猛烈的炮火给予迎头痛击，敌机见势不妙，仓惶逃走。我和两位解放军同志站在防空洞门口目睹了这场战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上午福州部队首长亲切地接见我，对我说：“你驾机起义的爱国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后来我由福州去南京，在南京特地为我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派人陪同我去上海、苏州等地参观游览，探亲访友。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应邀到首都参加观礼，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后来又去各地参观名胜古迹。我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神州山河雄伟壮丽，真切地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真理，对祖国更加热爱了。随机回来的两人，党和政府也将他们作为起义人员对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博大的胸怀和正确的政策。

参观结束之后，中央军委首长根据我的技术专长，安排我到国家体委滑翔学校担任飞行、滑翔训练指挥工作，为海军和空军代训

飞行员以及为各省市培训滑翔教练员、运动员。我以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将多年来刻苦学习的飞行技术无私贡献给人民的滑翔事业。学校培训出不少滑翔健儿，多次创造了优异的滑翔成绩。

1957年3月29日，我在河南安阳地区上空进行滑翔机飞行时，首创了留空5小时30分钟的滑翔纪录，并在同年达到可获得银质奖章的水平。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育下，我仅仅做了一点应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予我极大的荣誉和鼓励，多次选我为先进工作者和上海市劳模，出席劳模代表大会。

十年动乱期间，我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下车间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我为市政府参事和市政协常委，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1983年12月，我赴京参加“颁发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人员证书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习仲勋、王震、杨尚昆、余秋里、宋任穷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我们，并合影留念。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同我们共坐一席，互相敬酒，气氛非常热烈。同机归来的王钟达、唐镜同志也分别从江苏和四川赴京参加大会，大家欢聚一堂。

1985年1月12日是我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30周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领导在市政协为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参加了座谈会，并讲了话。晚上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还设宴款待我全家，他关心我家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寒问暖象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使我深受感动。

这次庆祝会给我极大的鼓励、教育和鞭策，在我有生之年，决心竭尽绵薄，继续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为振兴中华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今我还有不少同学、同事和亲友在台湾、港澳和欧美，我想借

此机会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希望和台湾军政界的同学、同事和亲友们携起手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写于1986年)